

ENGLISH—CHINESE
英译汉
技巧与实例

TRANSLATION
TECHNIQUE
AND EXAMPLES

主编·谭云杰 □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TECHNIQUE
AND EXAMPLES
HUNAN SCIENCE & TECHNOLOGY PRESS



英译汉技巧与实例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Technique And Examples*

主 编	谭云杰
编 者	谭云杰 胡德清
	艾朝阳 颜雪华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译汉技巧与实例

主 编：谭云杰

责任编辑：唐乘花

出版发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印 刷：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

厂 址：邵阳市双坡岭

邮 编：422001

（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厂联系）

出版日期：1996年4月第1版第1次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12.25

字 数：319,000

印 数：1—6,100

ISBN 7—5357—1998—8/H·71

定 价：13.80元

序

《英译汉技巧与实例》是一本由一位从事英语教学和翻译工作近三十年的教师主编的英译汉教科书。全书译文主要出自他的手笔。正因为如此，它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全书以一个有相当丰富的教学经验的教师身份，以组织课堂讨论的形式讲授常用英译汉技巧，以课内外练习的形式介绍英译汉实例。这样，书中没有言之无物的说教，也没有不着边际的空谈。讲理论，深入浅出，讲在点子上；练技巧，强调语篇水平和综合性，练在了实处。

二、节中选用的英译汉材料主要取自近几年 CET—4, CET—6、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英语考试考题和《大学英语》精读教程中的练习题和自测试题等。这样，既保证了作为阅读理解和完形填空练习时测试题的科学性、标准化，也保证了英译汉练习题的难度适中，符合高等院校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的实际。

这也是一本由一位爱学习、爱思考、勤于实践和写作的教师主编的书，这也使得该书具有以下另外两个特点：

一、把阅读理解、完形填空练习和英译汉练习结合起来，一套材料，多种题型练习，既可以克服使用一般翻译教科书往往难以避免的枯燥乏味的弊端，又可以讲练结合，提高学生实际阅读理解能力和翻译水平。

二、全书自始至终强调着眼全篇、全段，培养阅读理解水平和翻译能力，比起一般的英译汉教程教科书来略高一筹。此外，书中“英译汉中的若干隐含逻辑关系”一章，虽然主要是在已经发表的几篇有关论文的基础上的一个小结，涉及到的逻辑学领域内的问题欠全欠细，但从语义学和逻辑学角度讨论英译汉，立足点就显得高一些，因此，视野也就开阔一些。这样，对译界而言，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对读者而言，它也具有较大的指导价值。

希望全书的编者，特别是主编在该书作为英译汉教科书使用过程中不断提高，使之更加完善，为非英语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翻译教学作出更大的贡献。

刘重德

1996. 1. 31

前 言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高等学校文理科用)指出:“译”作为一种技能涉及的面很广,有笔译、口译,包括摘译、编译、英译汉、汉译英等,在培养学生具备这一能力时,还涉及到提高学生汉语表达能力和扩大学生知识面的问题。考虑到这种情况,大纲未把“译”作为教学目的列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大学英语基础阶段教学中不能以英汉互译作为教学或考核的手段。大纲建议“有条件的学校在基础阶段结束后开设翻译课,教授学生有关翻译的理论知识与技巧”。1995年7月15日,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发出通知,从1996年1月起CET—4中采用英译汉等新题型。通知指出:“采用新题型的目的是使各校重视教学本身,把精力放在课堂教学上,切实提高学生的实际英语能力,避免应试教学。”我们编写本书的目的

在于，为各高等院校在基础阶段指导学生学习英译汉技巧，或在基础阶段结束后开设翻译课提供一本实用的教科书和参考书。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一题多练，一书多用”，即以培养学生英译汉能力为主，与此同时，也提高阅读理解、完形填空等能力。全书用例证和练习形式提供 322 个句子，98 个短篇。英汉对照，既有利于教师课堂分析、讲解，也有利于学生自学时比较、揣摩。例句多以大学英语三、四、五级难度为主，阅读理解和完形填空等短篇，也主要取自近几年已公开的四、六级统考试题和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这样，就保证了翻译内容的取材广泛、难度适当，以及阅读理解和完形填空题的科学性和标准化。

全书分为六章，教师或学生在讲授或自学时不妨灵活运用。例如，第四章、第五章的英译汉练习，不妨先从做阅读理解和完形填空题下手，然后再做翻译练习。因为，表达的前提是理解，在做前两种练习时必然会要着眼全篇，对短篇中某些难句、长句，以及词语和词的意义理解必然下一番功夫，有了这个基础，再做翻译练习，不仅会顺利些，准确度会大些，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能逐步养成译词译句不忘综观全篇的好习惯，从而能够实现教学大纲提出的要求，“逐步发展在语篇水平上进行交际的能力”。此外，我们在编写第二章时不得已采用了主要用例句来讲解翻译技巧的办法。因为，脱离语篇去译句子，没有上下文的制约和照应，一个句子可能会有多种译法。而且，这种讲解法中潜在的害处还在于，编者如不反复强调词义、句意得依上下文这一点，如不提醒学生警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认识论和翻译法，则可能造成的弊端是不难设想的，这也是我们在讨论时多处分析某些专家、教授的败笔的原因。但我们毕竟还是违背心愿，用分析例句的形式编写了第二章——常用英译汉技巧。这是因为，我们在采用段落、篇章作为该章中的例子时遇到了麻烦——讲转换法时例子中又有逆序法、增译法或省译法等，而且，单就转换法而言，它又包括了词类的转换、语态的转换、句子成分的转换等等。话只能一句一句地讲，方法只能一个一个地介绍。“一口吃不下两

个包子”、“一口吃不成胖子”——我们在这样的凝聚着劳动人民智慧的俗语中受到启迪，从而走出“困惑”，违心地采取了逐项讲解的“举措”。明知不太保险还是下了这着棋，错误就恐怕会在所难免了；我们真担心在这章里为例句提供的参考译文因为强调了取出前的上下文而走了极端。

第三章专门讨论英译汉中的若干隐含逻辑关系。我们在学习和讲授翻译及口头、笔头翻译实践中发现，逻辑学知识对于指导翻译实践意义重大。我们在读一些逻辑学专著，但至今收获甚小。我们想把这个问题讲得深刻一些、全面一些，但至今力不从心。而我们认为，讲翻译不讲逻辑知识是不智之举。于是，我们把在1995年发表在《中国翻译》、《中国高等教育论丛》、《科技英语学习》、《英语辅导》上探索这个问题的几篇小文加以梳理、补充，写成了第三章。对于这些抛砖引玉性的文字，肤浅、片面以及错误之处，尚祈广大读者、译界前辈、同仁不吝指正。

本书是在不少专著、专论，即专家、教授们已获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我们在主要参考文献中也列出了其中的一部分，在此，特向我们在行文中引用过任何文字的专著、专论的所有作者表示深切的谢意！

最后，本书在付梓前承我国著名翻译家、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刘重德教授字斟句酌地审读了部分章节，作了若干重要修订，并作序对我们表示鼓励，我们深切感谢刘老的关怀和指教。

谭云杰

1996年2月

于湖南医科大学

目 录

(1) 第一章 翻译的标准与翻译的过程

(4) 第一节 翻译的标准

(11) 第二节 理解与表达

(20) 第二章 英译汉常用技巧

(20) 第一节 转换法

(39) 第二节 逆序法

(45) 第三节 增译法和省译法

(52) 第四节 拆句法和综合法

(58) 第三章 英译汉中的若干隐含逻辑关系

(59) 第一节 兼为因果的词与句子

(62) 第二节 定语从句中的隐含逻辑关系

(66) 第三节 时间/地点状语从句中的隐含逻辑关系

(69) 第四节 赏析与讨论

(83) 第四章 阅读理解和英译汉操练

(284) 第五章 完形填空和英译汉操练

(321) 第六章 句子和篇章英译汉操练

- (358) 附录一 参考译文和答案
- (373) 附录二 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委员会关于全国大
学英语四级考试采用新
题型的通知
- (379)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一章 翻译的标准与翻译的过程

在讨论翻译的标准与过程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一下中国翻译史概况。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我国翻译事业，有着三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口译无史迹记录，有记录可考的，是在三千年前的周代。据《礼记》的“王制”记载：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因为那时与汉人打交道的多为北方的外族人，所以“译”这个名称特别发达。随着译事的发展，“翻译”便代表转译四方的语言文字了。

这以后千余年里，有史可查的多为佛经的翻译（口译、笔译）活动。在西汉哀帝时代（公元前6年至公元1年），就有一个名叫依存的人到中国来口传一些简单的佛经经句。至东汉恒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就开始有了笔译佛经的活动。《隋书·

《经籍志》记载：“汉恒帝时，安息国沙门安静，齐经至洛，翻译最为通解。”安息国沙门安静，指的就是波斯人安世高。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30多部佛经。过些时候，娄迦谶来中国，译了10多部佛经。娄迦谶是月支国人，故又称之为支娄迦谶。他有个学生叫支亮，支亮又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都是当时很有名气的佛经翻译者。由于在讨论翻译标准时我们还会提到支谦，故对他再多加介绍几笔。支谦是汉末三国时出生在汉地的大月支人，名支越，字恭明。他“以汉末废乱，南度奔吴，从黄武至建兴中，所出诸经凡数十卷”（《出三藏记集》卷七《合首楞严记》）。在这以后，在东晋的佛教大师道安（312—385年）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翻译了《鞞婆沙》等梵文的佛经。在此期间，道安还请来了印度（当时的天竺）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改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主张意译，译有《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中观论》、《十二门论》、《百论》等三百余卷。到南北朝时，应梁武帝（502—547年）之聘，印度佛教学者真谛来中国，译有《摄大乘论》等49部经论。

从隋代（590年）起至唐代，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的时期。我国古代翻译界巨星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出发去印度求经，17年后回国。回国后主持译场，在19年内译出佛经75部，共1335卷。他还把老子的一部分著作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与玄奘同时从事佛经翻译的，还有实叉难陀、义净、不空等译者。

北宋时代乾德开宝年间（963年）宋太祖曾派人西去印度求经，印度也曾派人前来传经。宋太宗（976—995）在开封的太平兴国寺内兴修译经院，翻译佛经。元代（1271—1368），拔合思巴、管主八等人译佛经10多部。明代（1368—1644）只有智光等一、二人译了几部佛经。清代（1644—1911）只有工布查布等五人译了几部佛经。

从明代万历年间（1573）至清末，佛经翻译每况愈下，一片衰落景象，但在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等方面，却出现

了一些著名翻译家。明代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清代林纾（琴南）及其合作者用口述笔记的方式译出了 160 多部文学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还有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在我国新文化启蒙运动中作出过突出贡献。严复于咸丰三年（1854）生于福州，他在 1898—1911 年间，潜心翻译，译作多系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其译作中著名的有赫胥黎（T. H. 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亚当·斯密（A. 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等。他在 1898 年出版的《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尽管有人反对，但总的说来被奉为译学圭臬，历久不衰。

“五四”以后，1927—1937 年这十年是中国新文学的鼎盛时期。也是翻译文学呈现出兴盛局面的时期。这十年内，各种翻译文学书籍多达 1620 多种。我国近代翻译史上卓越的先驱者鲁迅、瞿秋白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翻译界日益繁荣。1976 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翻译界迎来了第二个春天。1982 年，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随后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了地方翻译协会。学术研讨气氛活跃，各种译著越来越多。可以肯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译界也必然会在翻译理论和实践方面迈出更新的步伐。

翻译是友谊的桥梁，交流的桥梁，合作的桥梁。让我们珍惜近三千年的翻译史为我们积累的宝贵文化遗产，学习前辈的经验，勤学苦练，为促进友谊、交流和合作而学习好翻译技巧，提高翻译能力。

第一节 翻译的标准

所谓标准，是指比较或评定一件事物的准则，或者某一事物本身符合准则，可供同类事物用来比较、核对。就翻译而论，其标准是指的指导翻译实践的原则、衡量译文质量的尺度，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翻译工作者努力的方向或力争达到的目标。人们对翻译标准的提法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深化，并使之日趋科学化的。结合我们在前面简述的我国翻译史，了解我国译界对翻译标准的认识、完善的过程，对于指导我们对英译汉技巧的学习很有好处。

翻译理论来源于翻译实践。我国最早的翻译理论研究是以对比方法出现的。在我国佛学史上，三国两晋时期就出现了不少比较佛经异译本的著作。如支谦就把《陀邻尼》、《总持》、《微密特》三种译本编纂为合本，并评议说：“此经凡有四本，三本并各二名，一本三名，备如后列。其中文句参差，或胡或汉音殊，或随义制语，各有左右。依义顺文，皆可符同。”他从比较研究中发现不同译文“文句参差”、“或胡或汉音殊”、“随义制语，各有左右”等问题，为后来研究翻译方法，制定音译还是意译以及如何下定义或统一名称等提供了思路。他还在《法句经序》中提出“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可供我们参考和借鉴。

支谦以后有一个支敏度。他在西晋惠帝年间(290—306年)编纂了《合维摩诘经》、《合首楞严经记》。支敏度在《合首楞严经记》中，对支谶和支越（即支谦）的译文评议说：“（支谶）博学渊深，才思测微，凡所出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支）越才学深彻，内外备通，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然其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显意，真可谓深入者也。”支敏度所揭示的“质”（不存文饰）和“文”（颇从文丽）两种翻译风格，为后人研究翻译评论以及讨论翻译标准开了一个头。同时，他还在《合维摩诘经序》中说：《维摩诘经》“在

昔汉兴，始流兹土。于时有优婆塞支恭明，逮及于晋，有法护、叔兰，此三贤者，并博综稽古，研机极玄，殊方异音，皆通关解，先后译传；别为三经，同本人殊出异。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或方言训古，字乖趣同；或其文胡越，其越亦乖；或文义混杂，在疑似之间。若此之比，其涂非一。”支敏度对支谦、法护、叔兰三种译本的译论，提到了翻译实践中常常涉及到的语序和句序、增译和省译、选词以及表达的忠实程度和准确性等问题，对我们在比较、揣摩中鉴别、欣赏和学习翻译理论和技巧，很有启发意义。

东晋佛教大师道安（312—385），主张“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

北朝末年及隋初，彦琮著《辩证论》，主张译经“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他还提出译者应该：（一）“诚必爱法，志愿益人，不憚久时”；（二）“襟抱平恕，气量虚融，不好专执”；（三）“耽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炫”。

唐僧（玄奘）是我国佛经翻译史上集大成并后来居上的翻译家。他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意即忠于原文，通俗易懂。

清朝末年，马建忠著《马氏文通》，提出了“善译”之说。他说，翻译时“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栴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以然”。这些精辟、深刻的见解，对于我们翻译过程中的理解和表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严复（又陵）在翻译西方著述方面作出过突出贡献，翻译界一直把他提出的“信、达、雅”三原则奉为圭臬。严复在1897年天津创刊的《国闻报》上发表了《天演论》的译文。为对他提出的翻译三字原则了解得更多一点，我们从《天演论》“译例言”中摘引前三条如下：

1.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疑倒

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信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

2. 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则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名。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3.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雅。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字原则，有人尊为翻译界金科玉律，奉为译事楷模，也有人提出挑战、反对或否定。为拓宽思路，利于读者在比较、鉴别中学习，下面我们对 30 年代翻译标准的论战作一个简介。

这场论战始于梁实秋先生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该文针对鲁迅《卢那卡夫斯基：文艺与批评》，以鲁迅文章中三段结构复杂、语意艰深的句子为例，批评他的“硬译”为“死译”，说那些句子读起来“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并说“曲译固是我们深恶痛绝的，然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也主张“宁可错些，也不要不顺”、“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

针对上述主张，鲁迅先生撰写了《论“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几条“顺”的原则》等文章反驳，并针对梁、赵的“宁信而不顺”等主张而提出“宁信而不顺”的观点。

瞿秋白也于 1931 年给鲁迅写信，在称赞鲁迅译文忠实可信、批评严复和赵景深的翻译理论的同时，也反对鲁迅“宁信而不顺”的主张。他提出：“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

从原文中得到的概念，这样的直译，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为着保存原作的精神，并用不着容忍“多少的不顺”。相反地，容忍“多少的不顺”（就是不用口头上的白话），反而要多少的丧失原作的精神。”

直接或间接参与这场论战的还有林语堂、陈西滢、叶公超等著名文人。

陈西滢于1929年在《论翻译》一文中说：“……严氏的第三个条件，雅，在非文学的作品里根本就用不着。”“……在翻译文学书时，‘雅’字或其他相类的字，不但是多余，而且是译者的大忌。……‘达’字也并不是必要的条件，即如法国的大小说家 Marcel Proust，英国现代的作家 James Joyce，以及许多印象派、表现派的作家，他们的文学作品绝对不是‘明白晓畅’的，要是译者想在‘达’字上做功夫，达原文的不可达，结果也不至曲译不止也。”“译者在译书之前，不应当自己先定下一个标准，不论是雅，是达，是古，是通俗，是优美，是质朴，而得以原文的标准为标准。”陈西滢在文中还将翻译与临画相比拟，提出了著名的“形似、意似、神似”论。他认为“意似的翻译，便是要超过形式的直译，而要求把轻灵的归还它的轻灵，活泼的归还它的活泼，滑稽的归还它的滑稽，伟大的归还它的伟大”，而神似的翻译则是“得原著神髓”的翻译，因而是最理想的。他还在文中提到了“同化之境”一词。

30年代关于翻译的标准论战就简介到这里。不过，我们需要强调几点。第一，鲁迅先生只是为了反击“宁顺而不信”的主张才针锋相对地提出“宁信而不顺”的观点的。其实他关于翻译的原则，主要的还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题未定”草）第二，梁实秋是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者和文学大师，是汉、英语言大师和辞书编纂专家，除从事文艺批评之外，他还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编了30多种英文词典和教科书，是一位译坛巨匠。第三，提出“宁错而务顺”的赵景深自己后来说：“我虽不是不要信，